

《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18卷,共有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11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10年的历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讨论。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

[作者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郭蕾)

抗战史研究“三调”

江 沛

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为契机的宣传热潮逐渐散去,各地抓住机会兴建了一批抗战纪念馆,树立了一批抗战名人塑像,出版了一批各类史料,发表了大批研究论著,召开了各个层次的学术会议和纪念会、座谈会,抗战史研究从以往由批评日本无视历史的激情和相对清淡的学术探讨共同构建的复杂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外交需求及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间的复杂关系得到公认,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再次得到极好诠释。

针对抗战史研究的新态势及相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史的诸多细节尚需考察,应回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状态,“把历史的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掘出抗战与中华民族崛起、中国政治格局变革、冷战局面下中国国际环境变化间的深刻意义及影响,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对此,已获不少成就的抗战史学界,的确应该予以深刻体会,不仅要努力发掘、利用并对比各方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思考抗战史实如何重建、史料基础如何夯实、经历者如何贡献客观记忆的问题,还要关注如何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抗战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从国际化视野分析中国抗战与二战时期欧美各国间外交及战略利益博弈的问题;日本是中日战争的发起者,也是战场的主导者,那么如何从日文资料中把握日本外交与政治动向、日军战略方针与战场走向的关系应是关键,从军事学的角度思考中日双方的军事体制、兵力部署、战术结构及战役特征,同样不可缺少;在充分认识战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日伪占领区三者关系及其影响的前提下,既要关注国统区、根据地民众的抗战动员及经济生活,也要下功

夫考察沦陷长达50年的台湾、14年的东北各省和8年的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思想观念的演变。我们总讲抗战是全民族的苦难记忆,但置身战区的炮火中与身处战场之外甚至连日机轰炸都未经历的西北区域民众,他们对于战争的记忆很可能视角不一、感受不同。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与研究。

认真细化抗战史研究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深入思考、扩展对抗战重大史实构建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是迫切的。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①,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依托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提出的历史认识论值得借鉴。柯文认为,历史认识中存在着三条路径:事件本身、经历者表述与理解、基于种种原因的神话再造,三者间特别是第一条与后两条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三者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及认识,展现了各自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构建。

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建构和讲述中国抗战史,同样存在着客观事实、经历者局限与神话传说间的差异性,三者共存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深刻认识战争、汲取经验与教训是有问题的。在此仅举三例以为说明。

(一)战时中共创建的华北各根据地,多是远离城镇和交通线的偏远乡村。面对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素质较低、民族国家观念淡薄的农民群体,中共的战争与革命动员存在巨大困难。在战争中,由于男性青年多参加地方武装,乡村存在巨大的劳力短缺,战争后勤及行政管理也需要人手,在女性解放观念及服务现实的双重需求下,女性走出家庭、投身战争与革命就成为必然,其间妇女解放的政策因革命及战争的需求时有变化,女性解放的追求要让位于服务现实的需求而不是相反。^②在战时宣传及战后的历史记述中,各根据地的女性解放多只讲是中共政治理念及动员的结果,缺少史实梳理的支撑,对传统习俗、经济困难之于革命及战争的制约作用认识不够,从而形成了一些类似神话传说般的叙述,如健步如飞的妇救会主任、女游击队长等形象,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问题是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晋冀鲁豫偏远山村的女性仍多缠足,放足者偏少,恰恰是中共各级政权强令放足,才使这场祸害女性千余年的恶俗得以遏制,但却难以保证已缠足女性避免战争的祸害,不少女性正是因小脚才难逃日伪“扫荡”的,也因此难以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1942—1943年间,以河南为中心爆发了一场大灾荒。据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估计,仅在国统区河南各县,就有300万人死于旱荒。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更透过强烈的视觉冲击,让灾荒的残酷性及死亡300万人的巨大数字深入人心。证诸史料,当时各地灾情有一定的差异性,不仅有大旱,也包括风灾、雹灾、蝗灾等;各县灾情轻重不一,1942年各县年均收成是往年的三四成;尽管河南省各地方政权存在管理混乱甚至贪污的问题,但国民政府还是投入了大量救灾款粮,第一战区各部官兵曾将大批军粮捐助民众,河南省及各县、镇政府也支持灾民逃荒移垦,各项救灾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灾后前后两次统计,死亡人数分别是148万人(应包含有逃荒人口)和28.8万人^③,虽然难以定案,但史实与媒体渲染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

(三)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1938—1945年间,有十几个省全部或部分沦为敌占区,人口在1亿以上。站在谴责日伪统治残酷性的立场上,国内涉及沦陷区研究的几乎所有论著,除讲述民众生活的困苦外,多以经济掠夺、野蛮统治、“集家并村”、设立无人区、细菌战与化学战、娼业散布、烟馆林立、毒品泛滥、抓捕劳工与慰安妇等为主要内容。然而,台湾50年、东北14年及大部

①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江沛:《“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沦陷区的8年,民众如何看待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权,如何看待生活及未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在持续性贫困中如何度日?沦陷区民众与日侨群体间如何相处,是区分军人与民众还是皆以“兽类集团”视之?日军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但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能否持久,日伪沦陷区的产业与贸易政策究竟如何?汉奸政权也需要财政支撑才能运转,其财政来源何在?仅靠抢劫民众可以保证吗?稍有经济学常识者都会否定这一判断。汉奸政权的奴性特征是无疑的,但其利益诉求与日军绝对一致吗?伪政权的运作过程是否毫无自主性?汉奸投敌原因诸多,心态各异,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利益甚至不惜卖国求荣,这是需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深入探讨的。

三个事例,分属中共根据地、国统区及沦陷区,在相关的历史叙述中,是以客观事实为骨干的,但的确也夹杂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亲历者的片面口述与有意识的选择;在浓重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我们对中共抗战及根据地建设的总结以经验居多,难以展开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客观评价,当然也不能接受对日伪政权的中性表述,抗战史研究中的“三调”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问题是,三个事例纯属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具有普遍意义的话,抗战史研究的重大问题随之而来:今天的历史叙述与已有的事实间究竟有多远?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抗战军民的真实情感?是否充分理解了沦陷区民众的无奈沉默,对灾荒与战乱的苦难描述是否准确?后代会问:以日本的国力,他们凭什么敢于对中国肆无忌惮地出兵?如果没有外部支援,我们可以单独战胜吗?个中的矛盾与龃龉,本是历史复杂性的具体体现,却被当下的抗战史粗描给淹没了。

日本方面对中日战争史的表述同样存在上述的“三调”问题,需认真梳理,但不能因此无视其资料的价值。在中日战争的多数时间里,日军一直是战场上的主导者,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都由日方发起,对各沦陷区的统治政策也是日方提出并实施的,中方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的境地,国际外交也多是围绕着英美对日、苏联对日和中日间展开的。因此,对日本战略思想、政略与军事的配合应予以重视,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不能忽视。日本的和战政策、其北上抑或南下政策及对中国战场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至为关键,如果没有对日本资料的借鉴,不去深切思考日本的国际战略,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于二战及抗战进程及特征的理解。抗战史研究不能缺少日方资料这一“调”。

我们需要在大量多方史料的基础上重建抗战史实,从细节入手、从二战史的宏大视野切入、力求避免情感与道德的纠缠,剔除神话成分与亲历者的片面性,还原历史的真实。最近10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电子化档案大批量公布,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也在推动日文资料的翻译和出版,相信这一状况很快会得到改善。

客观事实显然是有别于神话的历史与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但至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叙述中,都包含了事实、经历与神话的多种因素。历史学家构建的叙事,本身也包含着诸多其他因素,如不同时期史学家所处的环境、中日关系的好坏及相互认同程度等,都会影响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和表达,并不完全与事实相关。如果完全屈从于一种并不稳定的非学术标准而放弃了史学追求真相的职责,史学家也极易成为神话历史的参与者。^① 亲历者的认识,会根据不同历史语境的需要加以修正,有时也会在彰显或隐蔽自身作用上进行取舍,他们因局部参与而难以有全局性的视野。神话的表达多出于道德情感及民族国家立场,其取向反而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人相信神话比事实更具有激励价值,这使得神话历史的叙述常常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且总有市场。问题是我们描述的日军的弱智,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上的轻松叙事,遮蔽了日本对华政略与战略的内含,屏蔽了我们的困顿与弱点,甚至无益于对战争残酷性的理解并汲取教益。如柯文所言,其实影响历史演进的因素过

^①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5页。

多,相互关系极其复杂,头绪较多,但表述历史却要求尽可能条理化和明晰化,二者间的差异实质上也是事实与表述间的差异。

走过70年的抗战史研究,历经宣传及政治需要阶段、学术研究乏力阶段,再到国际化背景下回归学术但同时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挑衅的状态,影响抗战史研究的外部环境始终难以安静。抗战史的研究需要在“三调”间游走,既要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又要梳理经历者口述的真伪,还要对史实进行细致的分析,难度极大。经历者的认知与神话传说,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同样具有史学史意义上的重要价值。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努力排除所有干扰接近客观事实,发掘出历史演变的特征,找到历史与现实间真实的延续性线索。

现代历史学的表述及定性,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展开的。毋庸置疑,在抗日战争史和沦陷区的研究中,捍卫民族—国家立场的定性是主流,这一出发点及问题意识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多数的相关研究止步不前,影响了视野的开拓。此外,抗战时期的历史虽以抗战为中心,但仅以抗战的单一眼光考察,也会遗落诸多重要历史事实,反而会影响对抗战史的认识。因此,今后的抗战史研究,应该对现实政治需要特别是民众情感需求有所超越,面对经历者的片面认识与神话传说的描绘,要清醒地意识到“三调”间的差异性,应力求站在倡导和平、维护民族生存权及人权的高度,通过细化基础的定性研究,澄清有关抗日战争史特别是关于沦陷区史研究中的误区,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促使人们在客观基础上理性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细化研究以扎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根本,是科学定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所在,它可以给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降温,更可以强有力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论调。

[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

李金铮

任何社会、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联结而成的,并由此形成“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也可以说是“关系”史。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挖掘和揭示各种“关系”的互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敌占区三个区域同时并存,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部的关系犬牙交错,波诡云谲。每一区域既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又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区域发生“关系”的产物。不同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整体的抗日战争史。这一迷离的形态和格局,为历史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无疑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试以其中一个区域,来说明以上意涵。譬如,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要想做出真正有深度的研究,就必须以此为中心呈现“关系”的多面性。它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关系: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根据地与国民党敌后游击区的关系,根据地与大后方国统区的关系,以及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关系。除此以外,或许还应该涉及根据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不能不说,以往学界也包括我自己,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多是孤立的个案,从多面“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探